

1927年毛泽东赴“鸿门宴”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到农村去开辟革命根据地。1927年9月26日，毛泽东接到江西省委来信，说在宁冈地区有一支党的武装——袁文才部。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就曾听说过宁冈和袁文才的情况，所以接到此信后决定向宁冈、井冈山一带进军并在那里寻求立足之地。9月29日，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三湾村，进行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与此同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袁文才。

袁文才收信如临大敌

袁文才接信后如临大敌。他忧心忡忡地召集部下共同商量应对之策。并派龙超清和陈慕平等3人作为他的代表，拿着他的亲笔信去三湾见毛泽东。信中说：“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毛泽东看信后没有表现出怒意，而是平心静气地向龙超清等讲明部队上山的主张，表示不会威胁袁文才部的安全。相反，如果两支队伍可以合作，将增强革命的武装力量。最后，他慷慨地送给龙超清3人

毛泽东一行七人来到大苍村赴约。尚未完全放下戒备的袁文才备下了一席鸿门宴等待毛泽东到来，还预先在林家祠堂里埋伏了20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



(左)袁文才 (右)王佐

每人一支枪，希望他们能够将团结合作的想法向袁文才阐明。

时隔不久，他率部进驻离三湾30里地的古城，召开了古城会议，确定了团结、改造袁文才部队的方针。代表之一的龙超清参加此会后便在毛泽东和袁文才之间奔走传递双方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沟通，袁文才终于同意在大苍村林风和家里与毛泽东会面。

10月6日，毛泽东一行七

人来到大苍村赴约。尚未完全放下戒备的袁文才备下了一席鸿门宴等待毛泽东到来，还预先在林家祠堂里埋伏了20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

毛泽东淡定赴宴

毛泽东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但为了部队能够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明知有危险也要淡定赴会。毛泽东见到袁文才后，首先打消他的戒备之心，让他明白自

己的到来并不会对井冈山地区造成威胁，相反会增加革命的力量。毛泽东还向袁文才谈了自己的斗争主张。毛泽东侃侃而谈，其渊博的学识和大将气度令袁文才十分钦佩，他认定毛泽东是个人物，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他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临别时，毛泽东提出赠送给袁文才部100条枪。此举令袁文才十分意外和感动，他当即回赠了毛泽东1000块银元，表示对革命军的感谢，并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医院和留守处。

通过袁文才的引荐，毛泽东还结识了袁的把兄弟王佐。王佐当时也掌握着一支武装力量，毛泽东再次通过赠枪的方式赢得了王佐的信任。不仅如此，他还用了个十分绿林化的方式把友情筑牢。为了能与王佐搞好关系，他进驻茨坪后，指示已任王佐部队党代表的何长工在一日深夜突袭土匪尹道一的巢穴。这个尹道一作恶多端，也是王佐的“死对头”。何长工将尹道一的人头割下来送给了王佐。王佐十分感激毛泽东，当场表示“从此以后跟定了共产党”。

据《党史文汇》

习仲勋亲自“挡驾”不让儿子调进北京

在延安时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担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常常在家庭饭桌上高声吟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围坐在桌前的孩子们也稚气地和起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习仲勋对子女的教育是慈爱而严格的，他特别注意从小事抓起，培养孩子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品德，不允许有任何的优越和特殊。孩子的衣服和鞋袜，都是依次“接力”，大孩子穿旧了打上补丁让小的再穿。

习仲勋的长子从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户县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了1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军后勤学院恢复，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他就因所学专业对口被选中，并迅速办妥了调动手续。但就在即将启程赴京报到时，却没有了消息。

原来习仲勋知道了此事，亲自出面“挡驾”。他未和儿子商量便给后勤学院领导做工作，让撤回了调令。他认为干部子弟不能特殊，应当带头在艰苦地方工作。习仲勋还让陕西省委主要领导帮助做说服的工作：后勤学院需要科技人才，陕西同样需要科技人才，而在陕西会更好发挥专长，不能让人说习仲勋刚恢复工作，儿子就调到了北京，这样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贾巨川

叶剑英感慨：主帅无能 累及三军

1938年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里，毛泽东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见于《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但毛泽东要罗瑞卿读的却是《后汉书·班超传》。记载，西域都护班超离任，继任的任尚前来请教：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收。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其中水清、至察并非指为人的清或浊，而是指对人的宽和严。“性严急”的任尚对班超的话嗤之以鼻，结果是西域叛乱，负罪还朝。罗瑞卿的“严急”怕是不亚于任尚。

陈泊曾被毛泽东称作延安的福尔摩斯。1949年10月，叶剑英为解决乱象如麻的广州治安，把他从江西陈正人那里要到广东。陈泊和陈坤（原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一起，利用反正的敌特和当地的三教九流，组织便衣队，侦缉、破案，使广州治安状况迅速好转。叶剑英在给公安部的信中说：“广州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安，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然而，二陈的做法，却不为水至清的罗瑞卿所容。1950年召开全国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在闲谈中讲了些广州的事，罗瑞卿当场大骂，说二陈违犯政策乱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951年，公安部

拘捕了二陈，并株连了数百人。开始定为“国际间谍”，后来又改为“包庇反革命”，陈泊判刑十年，陈坤判刑八年，二人均瘐死狱中。直到1982年，冤案才得以平反。

二陈被捕后，叶剑英曾找罗瑞卿缓颊：“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头上。”罗瑞卿说：“那是你的想法。”叶剑英无奈，在华南分局会上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陈泊的夫人吕瓊，向邓颖超递了一份申诉材料，邓仔细看了后，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周恩来调阅了案件材料，还和罗瑞卿通了电话，但结果是：吕瓊从此不许探监。

据《历史学家茶座》

蒋介石逃亡台湾不带张国焘

张国焘在武汉宣布脱离共产党，各报刊着实热闹了一阵之后，渐渐平静下来。蒋介石对张国焘的投靠，开始也高兴了一阵，他嘱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副局长戴笠照料一切。

张国焘在军统期间，还接受过个别的共产党的叛徒，还现身说法，劝说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叛变，但常常不能如愿。

蒋介石和戴笠原指望利用张国焘这个“带头羊”，对中共进行大规模的策反工作，但张国焘到军统后的工作令他们大为失望。

1948年，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张国焘也惊恐不安，考虑自己的退路。这时，蒋介石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

毛人凤，要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要劝他们留下。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中共叛徒决不会再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让他们去台湾，只能增加负担。蒋介石还特别指示毛人凤，让他劝说张国焘留下。

1948年冬的一天，毛人凤在上海家中请张国焘吃饭，邀沈醉作陪。饭后，毛人凤还在重复他们谈话的主题：希望张国焘留在大陆，并说明这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张国焘听了立即表示：他已考虑过了，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毛人凤则再三劝说张国焘，说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

湾的作用大得多。张国焘低头沉思了几分钟后，慢慢地抬起头来，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我实在受不了。就这样，毛人凤同张国焘的谈话不欢而散。

张国焘走后，沈醉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张国焘落入共产党之手呢？毛人凤回答说：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如果他不愿意留在大陆，台湾是不会欢迎他去的。

张国焘没有听从毛人凤的劝说。他把《创进》周刊停刊，于1948年11月携全家去了台湾。他当时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据《张国焘传》

● 党史上的今天

彭德怀全歼第29军

1948年3月3日，彭德怀率部在瓦子街之战中全歼国民党第29军，此役国民党军被歼2.9万人，中将军长刘戡自尽。

2月24日，西北野战军进至宜川城外，胡宗南得知宜川城被围，一面令宜川守军坚守待援，一面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军部和整编27师、第90师共8个团驰援宜川。彭德怀留5个团继续围攻宜川城，集中9个旅占领铁笼湾段公路两侧高地，等待国民党军全部进至该段隘路后发起攻击。战至1日17时许，将刘戡部2.4万余人全部歼灭。2日，解放军一部突入城内，至3日8时，全歼守军。

据中国青年网

中共实行“三三制”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容纳各方面的人士，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施政方针，保障各抗日阶级的人权、财权，厉行廉洁政治。

这种规定是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广泛地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领袖家风

陈云家庭讲和谐

陈云的家庭融洽和谐，他很喜欢那种换尿片子、晾衣服的家庭气氛。和于若木刚结婚时，他就说：“我是个老实人，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于若木写给在英国的大哥的信中说，她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陈云是一个正直的人，非常和蔼善良，从来不发脾气。

陈云对于若木的确很关心。“文革”中，于若木因看不惯江青的所作所为，用真名真姓贴了两张揭发批判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要开除党籍，隔离审查。陈云不避风险，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说情，最后总算保住了于若木的党籍。

陈云去世后，于若木深情地撰文说，在我和陈云同志一起生活的50多年中，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另外，陈云从不束缚每个子女的个性发展，也不刻意让他们按照什么标准去生活，而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教导他们做一个正派的人，心态平和的人和普通人。

据《学习时报》